明末清初“俗学”小考

陈 宝 良

披览明末清初的史籍，尤其是学者论述当时学风的记述，常常见及“俗学”这一名词。俗学，顾名思义，则为鄙俗之学或俚俗之学的意思。这种称呼本身就包含有贬视的意向。但若把“俗学”放诸明末清初时代，就有其特定的含义所在。它既代表着明末清初的弊端学风，又预示着崭新学风的行将来临。那么，“俗学”在明末清初究竟有什么特定的含义呢？它究竟包含什么内容？本文就此略加考述。

“俗学”之所以有作一番小考的必要，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更由于作为它的对立面，则是一代崭新的学风——实学。兴实学，这是明末清初一代学风之所崇尚。考“俗学”一词之出现，较早的见于钱谦益的论著中，而且也是钱氏率先贬斥俗学，倡导人们务实。钱谦益曾有一段概括“俗学”的话，其中有言：“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两者皆俗学也。”①他把俗学限于“制科之习”和“道学之习”两端。我们知道，明以八股取士，士子经术所用均为朱熹注的《四书》。所以当士子作八股时文时，只不过背诵朱熹的经义而已，对经学毫无新的发挥，皆以此汲汲于功名。此乃整个明代人才败坏的弊端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明末尚有一种衰颓学风，那就是王学末流，也即“道学之习”。他们束书高阁，游谈无根，终日沉醉于空谈心性之中，实为一种迂腐之学。此为“俗学”之另一端。钱谦益把俗学限于此两端，从而加以鄙弃。

复社历来被视为东林后劲，其学当然也会承东林之遗绪。钱谦益在当时被目为东林党魁，又执文坛之牛耳，而且与复社关系密切。②因而，继东林而起的复社，在学术上也提出了针砭“俗学”的宗旨。复社领袖张溥，当值崇祯改元初年之时，以贡生游学京师，在纵览郊庙辟雍的盛况后，又发出了一番无限感慨的话，其中就抒发了他痛斥“俗学”的精神。张溥喟然叹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析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③“尊遗经，砭俗学”，复社宗旨在此已历然在目。复社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砭俗学”，进而“复古学”，这在以后复社所定的课程中已经明确言之。复社所谓的“俗学”，究竟又谓何？根据以后复社所立课程，复社所指“俗学”，当为这样一种学风：“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④只要分别比较而言，复社所指“俗学”，仍然不外钱谦益所概括的两端，只是不明显而言罢了。

继复社以后能对“俗学”有所贬斥的人，应属顾炎武、黄宗羲两人。两人学术渊源各有所自，然皆有肇启于复社。据吴应箕《复社姓氏录》，顾炎武名列复社；黄宗羲是名公东林成员黄尊素之子，其在复社榜上有名更属有案可稽，而且黄宗羲还和顾杲、吴应箕等人作

《南都防乱公揭》，以反对阉党阮大铖而名震海内。正是这样两位复社的后劲人物，实为开创有清一代学风的中坚，对“俗学”也不约而同地有所斥责。顾炎武对“俗学”是如何摒弃的呢？他说：“至于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则为山复篑，当加进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务本原之学。”⑤这是顾炎武致友人周篆的书札中所写的一段话，极为精湛。那么，由此我们可知顾炎武所谓的“俗学”，是不涉六经的“心学”末流，它犹如春天的艳花，华而不实。当复社之时，已经指出了当时学者不涉六艺的学术弊病。顾炎武在此只是对复社的承袭，所指“俗学”也主要限于道学之习一端。倒是黄宗羲给“俗学”一词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⑥黄宗羲所谓的“俗学”，则是读书不究求于心的学术颓风。就表面而观，黄氏所贬的“俗学”不是为束书不观的道学风气，而是指读书多而支离破碎不求之于本心的学风。黄宗羲以王学正统自任，贬斥朱学很为有力；而对王学不免有所迴护。但是，他对明季王学末流却也极力排挤，而且力图在弃虚就实方面作出一些努力。他说”“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为不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⑦况且，他也是坚信：“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所以，假若我们以此为补充，或许对黄宗羲所谓的“俗学”，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钱谦益、复社、顾炎武和黄宗羲，他们的学术毕竟能找到渊源和演变所在。而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颜李之学，他们对“俗学”又如是观的呢？我们不妨举例以见颜李之学对俗学的看法。颜元（习斋）的弟子朱主一曾经说过：“明之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⑧在此，“俗学”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为单指八股科举制度；一为与八股时文并行另有一个“俗学”，即“囿虚习”的道学风气。但是，朱氏的“俗学”，我们认为更多的还是指科举一端而言。因为颜李学派除了反对宋儒的理、欲说以极力讲求事功外，最引起他们愤慨的则是八股科举制度。李塨在《平书订》中亦谓：“明代大学士，即相臣也，不用历练礼乐兵农、亲尝民事之官为之，而但以科举高第选入翰林，弄笔坐至馆阁。”所以，我们认为北方颜李之学把“俗学”归结为科举八股一端。

综合以上考述，“俗学”所包含的内容，昭然若揭：

其一，“俗学”应当是指八股科举之习。清初学者，激于明运的衰亡，对八股科举深恶而痛疾之。特别是顾炎武，认为八股的危害，简直就是扼杀人才。他说：“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⑨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也有同样的见解，认为八股科举是败坏人才，导致明代灭亡的原因。除顾、阎二人之外，抨击八股科举之弊者尚有黄宗羲和李颙。黄宗羲认为：“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⑩揭示科举之害而言辞更为激进的应推李颙。他将八股词章比为“洪水猛兽”，他说：“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然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兽，尤为何如也？”⑪封建时代的学者，他们当然不可能从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来考虑封建统治灭亡的原因，因而只得归罪于经济因素在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的反映——八股科举制。这也是我们不应苛求的。

其二，“俗学”应指道学空谈之习，也即王学末流学风。对于道学家的空谈心性的讲学风气，除了钱谦益以“腐”字给以酣畅淋漓的痛斥外，对此学风的批驳，则莫过于顾炎武。

顾氏对王学末流深有感触，他攻击曰："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⑫

所谓"道学之习"和"制科之习"，事实上在明末已经统一起来。所以，有的学者把"俗学"只指为其中的任意一端。明嘉（靖）、隆（庆）以后，心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更助长了空洞无实的学风，八股和心学同流合污，从而构成"俗学"弊风。顾炎武揭露说："自兴化（指李春芳）、华亭（指徐阶）两执政尊王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⑬即是指此。所以，以上所说的构成"俗学"的两个方面，在明末已趋于一致。

其三，"俗学"应当还指黄宗羲所谓的"读书多而不求之于心，则为俗学"。黄氏在批判"俗学"问题上，独辟蹊径，因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黄宗羲在论述学旨时，除了要求人们多读书以证"理"的变化，还要求人们返求之于心，因而与众异趣，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学风。黄宗羲和顾炎武学术风格的不同，除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所指出的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外，其中另一端，应当是顾炎武以"博学于文"为自好，而黄宗羲则是不但要求博学，而且要求返之于心。黄宗羲把"不求之心"视为"俗学"，无非是为清初学者过分强调"博学于文"而发，当然也体现了他修正"王学"的宗旨。

既然"俗学"这一弊端学风如此明显地存在于当时的学术界，因而对此弊端的改革，已为时势所必然。当时学者在批评"俗学"的同时，毅然弃虚就实，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学风，在学术方法上开创新途径、新方法。这就是明末清初"实学"之风的兴盛。挽救"俗学"之弊，途径虽略有不同，但目的却始终归趋于一。那就是，在"实学"基础上的有用之学。钱谦益提出的途径，一端是"多读书，厚养气，深造而自得之。"⑭另一端则是鼓吹求经于汉，要求学者务通本原之学。复社解救"俗学"的新方法，我们也可以概括如下："期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⑮复社主要是改革做八股时文的经义，来改变当时的学风。这一点与以后的吕留良做"四书讲义"的本意颇合（吕氏早年也热衷于社事）。顾炎武既提出了"鄙俗学"的主张，那么他又将开辟什么学风呢？主要有三端：一为舍学无理学，在经学上力求复古；一为"博学于文"，深殖学问根柢；一为主张君子之学以明道、救世为主。黄宗羲开创新的学风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按照黄宗羲的意思，假如一味拘泥于经术，则是"不适于用"，要避免做迂儒，就必须在精通经术的同时，兼读史籍；也即，黄氏把读史作为"应务"之本。北方颜李之学很有其独特的地方，他们挽救"俗学"的弊端，也不外乎两端：一为重实践，一为求事功。

总之，明末清初有鉴于"俗学"而萌芽产生的"实学"，与俗学有霄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俗学"弊病，无非在于疏于六艺经术，败坏人才，从而导致"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的局面，而改造后的实学，却正是一代崭新的学风，它要求人们以深殖学问根柢为途径、方法，以致用于当世为目的。这就是，随着"实学"的产生，明末清初所存在的"俗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后所出的"俗学"，必然又有它的新含义所在，而改革"俗学"的新学风也必将再次出现。晚清经世派的复出，就是最好的证明，

---

①钱谦益，《初学集》卷七十九《答唐训导论文书》《牧斋全集》本

（下转第61页）

都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理论水平，有的甚至已取得不少成就，反映了城市经济史研究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喜人前景。

闭幕式上，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付教授冯承伯同志应邀做了现代西方城市史研究概况的报告。最后，大会组委会宣布，鉴于沿海城市经济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尚需做长期的艰苦探索工作，建议沿海城市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下次会议初步定于1988年在连云港召开，由江苏社会科学院在其它发起单位协助下主办，本届会议名称定为：首届沿海城市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所收论文委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集。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上接第31页）

②复社领袖张溥谋求周延儒再相，钱谦益曾参与此事。可参见杜登春《社事始末》。当张溥去世后，张采曾请钱谦益作《嗣说》一篇，见蒋逸雪《张溥年谱》

③吴伟业：《复社纪事》

④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⑤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中华书局《顾亭林诗文集》本

⑥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载《鲒埼亭集》

⑦全祖望：《鲒埼亭集·甬上证人书院记》

⑧戴望：《颜氏学记》卷十

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条

⑩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三《科举》

⑪李颙：《二曲全集》卷十二《匡时要务》

⑫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中华书局《顾亭林诗文集》本

⑬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言"条

⑭钞本《牧斋有学集补遗》题跋，转引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

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⑯至乾嘉时期，汉学家所谓的"实学"反而已被人目为"俗学"。孙星衍在《汪中传》中说汪中"著《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皆依据经证，箴砭俗学"（《揅经室续集》卷三《儒传求传》）汪中针砭"俗学"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俗学"，它是原来作为"俗学"对立面的"实学"的变态。